

日本中世说话文学中的孔子形象

——以《十训抄》《宇治拾遗物语》为例

吴素兰 刘嘉韵

摘要: 日本中世说话文学的代表作品多有孔子故事,其原型出自中国书籍,但呈现了与中国不同的孔子形象:在充满儒教色彩的《十训抄》中,孔子既是权威者,也是被反驳者;在具有浓厚庶民气息的《宇治拾遗物语》中,极具权威的孔圣人形象则被凡俗化了。日本对于中国儒、道思想的吸收与改造由此可见一斑。而孔子权威的相对化,既与庄子思想颇有渊源,也是中世日本动荡不安现实的反映。

关键词: 孔子; 日本说话文学; 《十训抄》; 《宇治拾遗物语》

中图分类号: I313.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569(2015)04-0159-07

DOI:10.13658/j.cnki.sar.2015.04.021

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始祖,从古至今,在东亚地区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日本也是如此。早在日本应神天皇时期,《论语》就传入日本,成为了日本律令时代朝廷官员的必读书目。另一方面,孔子也对日本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日本说话文学就是典型代表之一。

说话文学是日本古典文学的一种体裁,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古代小说集。它多以说话集(短篇故事集)的形式出现,题目往往冠以《……物语(集)》、《……记》、《……抄》等,内容类似于中国的志人、志怪、笔记小说或者话本等^①。说话文学至中世达于鼎盛。其中许多作品,如充满儒教色彩的《十训抄》、汇集印度、中国、日本三国故事的《今昔物语集》、具有浓厚庶民气息的《宇治拾遗物语》、佛教故事集《古今着闻集》等,都收录了孔子的故事。日本中世说话集中的孔子形象与中国古典的孔子形象有何不同?中世说话集的编纂者们究竟出于何种目的?在何种情况下引用了孔子故事?故事中的孔子又被刻画成何种形象?这些都是饶有兴味的学术问题。高阳《日本中世的孔子说话:以〈今昔物语集〉为例》^②一文详细分析了《今昔物语集》中的孔子形象。笔者拟以《十训抄》、《宇治拾遗物语》为例,以中世说话集中与孔子相关的故事为研究对象,考察作品中孔子的不同形象。

一、《十训抄》中的孔子形象

《十训抄》是日本中世说话集中最具儒家特质的说话集。其中以简明易懂的说教口吻的

作者简介: 吴素兰,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

刘嘉韵,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助教。

作品居多,并大量引用了日本《大和物语》、《江谈抄》、《古事谈》等早期说话集以及中国《史记》、《汉书》等作品的内容。据统计,《十训抄》一共282篇故事,其中包含中国要素的有62篇;出现中国人物的有55篇;其中出场的中国人物超过100人;孔子出场次数多达10次(第一篇与第五篇各2次,第六篇有3次,第四、七、十篇各1次),主要是集中在说话集的中间位置,即第五篇《可撰朋友事》和第六篇《可存忠信廉直旨事》之中。从篇名中我们可以窥见孔子在这两方面的鲜明形象。

与其它世俗说话集不同,《十训抄》中的说话作品以劝服他人为目的,或是直接搬出名人,或是引用名人之话语,或是讲述与名人相关的故事。因此,即便不是中心人物,通过以该人物为例,或是引用该人物的话语与故事,也可以达到说教的目的。以这种形式出场的孔子占10次之中的8次。第五篇中孔子2次均以相同的形式出场,该篇序文写道:

鲁国仲尼痛失得意弟子子路之后,舍弃了(子路生前)两人互相荐举的事物。^③

第五篇在阐述良友的重要性的同时,列举出许多交良友的事例,继而讲述了关于孔子与子路的痛失朋友的悲痛与遗憾的故事:孔子痛失了弟子子路之后,不再进食子路生前两人互相荐举的食物。该故事典出于《礼记》:

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④

孔子为子路的死而痛哭,在得知子路的尸体被剁成肉酱后,不忍再食肉酱。对比可知,《十训抄》对《礼记》做了简化,省略了孔子哭泣以及不食用互相荐举的食物的理由等细节。

考虑到孔子的形象在整个说话集中的作用,我们不仅要看该故事的内容,还必须关注该故事在作品中所处的位置。值得关注的是,对比《礼记》与《十训抄》中孔子和子路之间关系的差异。《礼记》中的这个故事里并无明确指出孔子与子路的关系,而是将重点放在吊唁上。与此相对,《十训抄》中描述这一故事时,孔子称子路为“弟子”,并主张应该珍惜朋友。由此可知,与其说是弟子,孔子更是把子路视为朋友,刻画出孔子重视朋友的鲜明形象。

虽说《十训抄》汲取了原典的内容,但通过对主题的改变,它赋予故事以新的寓意,从而使故事中的人物形象略有不同。那么,在同样是论述朋友的重要性的第五篇之三,又是如何描写孔子的呢?以下是第五篇之三的原文:

后三条院于东宫时,送别即将赴任诸侯国的学士实雅朝臣,有感于惜别之情作诗一首:

州民纵作甘棠咏,
莫忘多年风月游。

毛诗中对上述诗句的解释如下:

孔子曰、甘棠莫伐、召伯之所宿也。^⑤

这个故事围绕诗句“州民纵作甘棠咏、莫忘多年风月游”展开,并引用毛诗来解释出自孔子之口的“甘棠”一词。《诗经·召南·甘棠》中歌颂施行善政的周召公曾经在甘棠树下休憩过,因此人民要保护这棵甘棠树^⑥。《十训抄》中的“甘棠咏”,也是用于百姓向实雅朝臣表达崇敬之意的词语。

《十训抄》虽然注明出处是《毛诗》,但实际上《毛诗》中并无这句话。原因何在?《十训抄》的编撰者对中国典籍与人物是非常熟悉的。尽管《诗经》中并没提及孔子,但是综览其它中国文献典籍我们可以看到,孔子论述召公与甘棠的故事,不胜枚举。如刘向《说苑》记载:

诗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传曰:自陕以东者周公主之、自陕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职,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断焉。陕间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后世思而歌咏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夫诗思然后积,积然后满,满然后发,发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叹其美而致其

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恶乎不行。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顺安万物,古圣之道几哉。^⑦

此处孔子的评论,与《诗经》的意思不尽相同,与其说是对召伯行为的称赞,更应说是在强调宗庙祭祀的重要性。孔子的这一观点在《孔子家语》中也可以看到:

子羔问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颡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祖颡顼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汤,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异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庙可也。若有虞宗尧,夏祖颡顼,皆异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庙乎?”孔子曰“善!如汝所闻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庙可以不毁,其它祖宗者,功德不殊,虽在殊代,亦可以无疑矣。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憩。’周人之于召公也,爱其人犹敬其所舍之树,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庙焉。”^⑧

孔子引用《诗经》甘棠诗后说:周朝人尚且爱戴召公,甚至敬仰召公曾经留宿过的树,那么我们也应该祭祀有功德的先祖。孔子引用《诗经》甘棠诗,是为了阐释祭祀的基准。

可见《十训抄》对中国典籍中强调祭祀的孔子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转换,将典故用于描写强调功德的孔子。这一做法与上述阐述的第五篇序文中出现的孔子形象极为相似。

再看第六篇序文:

有人曰,孔子曾经说过,一味地服从君主,并不是忠;一味地服从父亲,并不是孝。该争辩时当争辩,该服从时应服从。这才是忠,这才是孝。

永积安明认为,《十训抄》第六篇序文中的孔子的话是借用西汉孔安国编注的《古文孝经》。^⑨《古文孝经》云: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力争于父,臣不可以不力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从命不得为孝,则谏为孝矣。故臣子之于君父,值其不谊,则必谏争,所以为忠孝者也。重见当其不谊也。夫臣能固争至忠,子能固谏至孝也;人主忌忠谓之不君,人父忌孝谓之不父。忌忠孝,则大乱之本也。^⑩

该引文出自《古文孝经·谏诤章第二十章》。孔子解答曾子时指出,天子身边直言相谏的诤臣越多的话,国家就越繁荣。作父亲的身边有敢于直言力争的儿子,就能使父亲避免陷于不义之中。因此在遇到不义之事时,如果是父亲所为,做儿子的不可以不力争力阻;如系君王所为,做臣子的不可以不直言谏争。第二段是孔安国的评论,他认为只会服从命令并不是孝,只有直言力劝方为孝。因此,臣子对于天子,儿子对于父亲,必须对其不义之事相劝力阻。

《荀子》第二十九章《子道》篇中也有类似记载: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孔子不对。……子贡曰“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夫子有奚对焉?”孔子曰“小人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⑪

虽说论述时词语表达不尽相同,《十训抄》、《古文孝经》、《荀子》刻画的孔子均主张一味服从君主和父亲并不是真正的忠与孝。从《十训抄》第六篇序的后文来看,编撰者并不完全同意孔子的主张。在孔子的语言之后,编撰者加上了自己的见解:虽说对于君主、父亲、朋友遇到的不义之事,我们必须力争劝阻,但这终究并不是可行之办法。编撰者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要做到孔子所主张的那样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人们一般都讨厌劝阻自己决定的事,而偏爱附和

赞同。为了对应人的这一习性,应做到心地善良,为人处世心平气和。同时,编者还认为孔子的主张虽然正确,但没有效果。此处的孔子形象与《古文孝经》、《荀子》中的权威形象不同,在质疑、反驳孔子的主张之后,进一步提出:孔子的主张即使不算是错误的,但也是一个缺乏灵活性的形象。

二、《宇治拾遗物语》中的孔子形象

在《宇治拾遗物语》中,反驳孔子主张的观点尤为强烈。《十训抄》中,孔子以相关的人物事例出场的方式居多,而《宇治拾遗物语》中,孔子则以主人公身份出场。

《宇治拾遗物语》中的孔子故事、与其对应的孔子故事原型的中国作品名称、与《宇治拾遗物语》相似或相同的日本作品名称,见下表:

《宇治拾遗物语》	中国古籍	其他说话集(日本)
第 90 话 帽子儿与孔子问答事	《庄子·渔父》、《淮南子》、《说苑》	《今昔物语集》(孔子逍遥、值荣启期间语)
第 152 话 八岁童孔子问答事	《列子·汤问》、《法苑珠林》、《世说新语》	《今昔物语集》(臣下孔子、道行值童子问申语)
第 197 话 盗跖与孔子问答事	《庄子·盗跖》	《今昔物语集》(孔子、为教盗跖行其家怖返语)

这三篇与孔子有关的故事均与道家作品有关,同时也被收录在日本说话集《今昔物语集》的第十卷之中。一般认为《今昔物语集》成立于院政末期,比《宇治拾遗物语》尚早一些,全书由天竺部、震旦部、本朝(日本)佛法部三部构成,其中第十卷名为“震旦付国史”。关于《今昔物语集》与《宇治拾遗物语》的关系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本文不再深入考察。但由于《宇治拾遗物语》中出现的孔子故事均与《今昔物语集》有关,因此,笔者认为单纯与中国故事比较远远不够,还应通过与《今昔物语集》进行比较,方能更加明确《宇治拾遗物语》中的孔子形象。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 152 话“八岁童孔子问答事”。三篇之中为何要最先分析这一篇呢?虽然第 152 话篇幅最短,但它与故事原型的出入最大。这篇故事的主要内容如下:

从前,在中国,孔子路遇八岁左右的孩童。孩童问“太阳所在之处与洛阳哪一个更远?”孔子答道“太阳远,洛阳近。”孩童争辩道“太阳举目可见,洛阳却目不能及。因此,我认为太阳近,洛阳远。”孔子听后,感叹道“真是聪慧的孩子!”编者评论说“从来没有人这样问孔子。能这样问孔子的人,绝非寻常之辈。”^⑫

而在《今昔物语集》中,故事则是这样叙述的:

又,孔子行于路上,路遇七八岁上下的两名孩童。两孩童问孔子,一孩童说“日出时太阳近,日中太阳远。”另一孩童说“日出时太阳远,日中时太阳近。”先说话的孩童回应道“日出时太阳入开水般滚烫,至日中则渐凉。”另一孩童也反驳道“日出时温度低,日中时太阳则烫若开水。正是日出之时太阳近,日中则远。”两孩童如此争执不下,孔子在旁却无法断定胜负。

当时,两孩童嘲笑孔子道“原以为孔子博学多才,无不知晓之事,是个极其厉害之人。”孔子听后,不由感叹“此二孩童绝非寻常之辈!”^⑬

两篇故事内容略有不同,却都源自《列子》“正儿辩日”: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

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⑭

《今昔物语集》中的孔子故事均收录于第十卷“震旦付国史”中,而“臣下孔子、道行值童子问申语”由于不是最早出现的孔子故事,因此以“亦”作为开头词。并且,该故事收录在第十卷的“付国史”中,而故事名里面出现的“臣下”字眼。可见,这个故事是以国家为视点,把孔子视为该国家的臣子。《宇治拾遗物语》中则不同,故事以“今は昔”作为开头词,将读者带回从前,使读者身临其境,且无刻意强调孔子政治身份的意思。

从出场人物与故事内容来看,《今昔物语集》与《列子》相似之处颇多,而《宇治拾遗物语》与《列子》则大相径庭。首先,关于出场人物,《今昔物语集》与《列子》中,孔子均作为旁观者,并没直接参与辩论,只是给予判断和发表感想;而《宇治拾遗物语》中孔子直接参与辩论的主角之一。其次,关于辩论的主题和内容,《今昔物语集》跟《列子》的内容更为相近,都是围绕日出时的太阳与正午的太阳哪一个更近的话题而展开,孩童辩论的根据也都是以温度高低为根据;而《宇治拾遗物语》则不同,辩论的主题变成太阳和洛阳哪一个更近的问题而展开。再次,从人物形象来看,《今昔物语集》与《列子》中,孩童是辩论的主体,孔子只是充当评判的角色;《宇治拾遗物语》中,孔子直接参与辩论,是带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角色。最后,从故事的结果来看,《今昔物语集》与《列子》中,孔子最终无法给出判断而遭到两位孩童的嘲笑;而在《宇治拾遗物语》中,孔子并不是无法给出判断,而是无法反驳孩童的回答。

《宇治拾遗物语》中的辩论的距离问题也并非独创的,而是借鉴了《世说新语》中晋明帝

的故事: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⑮

可见,《宇治拾遗物语》“八岁童孔子问答事”在出场人物上借鉴了《列子》,而内容上则更多仿照了《世说新语》。亦即说,编者糅合了《列子》与《世说新语》的内容,创作了一个新故事。

事实上,在《宇治拾遗物语》所收的3篇孔子故事中,刻画孔子无法反驳对方的形象较为明显。“盗跖与孔子问答事”的最后部分写道:

孔子无话反驳,就从座位站起来,急忙出门上马。或因害怕的缘故,两度没抓稳缰绳,屡次踩空马镫。

这个故事原型出自《庄子》。小峰和明认为“该故事戏剧化的把焦点放在孔子权威的丧失的同时,赋予盗跖鲜明的形象。”^⑯虽说故事结尾写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打倒孔子”,但从故事整体情节来看,与其说《宇治拾遗物语》主张“把孔子打倒”,不如说是通过质疑孔子的理论、常识、生活基准,寻求日常生活的真理。

三、日本中世说话文学中孔子形象变异的社会背景及思想渊源

综上,以上两部作品中的孔子故事虽然汲取了出典的几乎所有内容,但是通过对主题的改变,赋予故事新的寓意,从而使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截然不同。而这种现象的发生与当时的日本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平安朝时期的日本模仿中国构建了律令制国家,国家政权掌握在贵族官僚手里,但是进入了中世以后,以前以侍奉贵族为己任的武士占据了土地庄园,权力逐渐增大,导致后来各领主为夺取领地引发战争。可以说中世是日本异常动乱时期,在阶级地位上来说,武士完成了由下至上的阶级更替。随着阶级更替,政权变化,社会发生大变动,人们的意识也会随之改变,因此日本中世常常出现受世人尊敬的人被当成愚蠢之人,受人轻蔑的人反而受人敬仰的社会现象。

日本研究者长野尝一曾经举过一个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源氏物语的主人公光源氏这种具有纯正皇室血统,擅长和歌管弦,而且非常受女人欢迎的美男子在中世这种战乱的时代竟被认为是一无是处的人。”^⑦

如《十训抄》中对待朋友、对待孝、忠等的看法和态度,与中国儒教中孔子的主张不同。中国儒家对于道义,即正确的做法和道德的基准,有着绝对的标准。而《十训抄》则主张基准固然重要,但更强调为人处世方法的重要性。这与《十训抄》的创作意图有着密切的关系。《十训抄》是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以规诫青少年为内容的作品。其序文里记述了编者的写作目的:

生活在这世上的人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应对这些事情,无关身份地位高低,能聪明地应对者得益多,愚笨应对者失利多。因此,我把至今的所见所闻的古今故事为材料,在这些故事里列举贤愚二类,褒奖好的例子,以坏的例子为戒,为提高未学善恶之道的年轻人的精神修养,把这些故事分成十部分,命名为十训抄。

虽然《十训抄》编者的真实身份现在尚无定论,但从序文中可以看出,《十训抄》的编撰目的是为了提年轻人的精神修养。而以此为目的的原因是,要应对当时的时代状况。当时的生活,人们必须作出更为聪明的抉择。可以说编者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为人处世的重要性。因此,虽然《十训抄》里借用了不少与儒家思想相关的故事,其儒家思想色彩非常浓厚,但借用这些故事的最终目的是阐述编者如何应对当时时代,即对为人处世的看法,以这一角度来看,编者借用的故事跟原典故所要阐述的观点出现偏差也属正常。

《宇治拾遗物语》中的孔子故事都来自《庄子》和《列子》。《庄子》和《列子》是道家的著作。《庄子》中涉及孔子及其弟子的内容颇多。石本裕之将《庄子》中与儒家相关的内容分为3部分:评论“儒墨”、评论儒家思想、评论儒教人物。中国学者方勇认为,《庄子》中的孔子形象具有多重性,可分为作为儒者的孔子、作为儒者表达道家思想的孔子、作为道家的孔子三种类型^⑧。

如前所述,《宇治拾遗物语》利用孔子故事去质疑日常生活的常识和基准等,从而达到寻找日常生活的真理之目的,这与《庄子》有相合之处。收录“盗跖”和“渔父”的《庄子》“杂篇”的最后篇章为“天下”。“天下”并不收录逸事,而是归纳总结编者的主张和理论。其中有云: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⑨

庄子认为,“百家”均有可用之时,亦均有不适用之处;仅凭“百家”主张并不能辨清世界的真理。“天下”的后文部分阐述了百家分裂的结果:

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⑩

庄子认为,百家的主张并不是适用于世界的“道术”,而是不一定何时都能派上用场的、非真正的修身治世之道的“方术”。该主张与《宇治拾遗物语》中通过对孔子的批判,即质疑日常生活的常识和基准来寻找日常生活的真理的观点有重叠之处。可以断定,《宇治拾遗物语》受《庄子》影响的可能性很高。例如,“八岁童孔子问答事”中,孔子无法给出与孩童不同想法的答案,即无法反驳孩童便表明了方术不是万能的。“盗跖与孔子问答事”与“八岁童孔子问答事”类似,原想说服盗跖的孔子因无法反驳盗跖而被驱赶出来一事,正刻画了儒学的欠缺之处。“帽子儿与孔子问答事”中,老翁得知孔子并非国家的王公大臣,听闻孔子只是因有才而参与政事并纠正错事之人后,便直呼孔子为“多傻的人呀!”并说“孔子应以在属于自己的地方度过一生为今生的心境,而不应该因世道而改变自己的心境”,认为以方术思考世事纯属无稽之谈,主张心境不以世道而改变方能看透道术。

通过考察得知,《宇治拾遗物语》将极具权威的孔圣人形象凡俗化。对此,高桥贡着《宇治拾遗物语的性格》中指出,与《今昔物语集》不同的是,《宇治拾遗物语》中出场的孔子等有名的人物,引人注目的不是人物相关的显赫事迹,而是通过指摘其弱点来使圣人或权力者凡俗化。凡俗化的孔子形象虽受到了《庄子》的影响,但不同于《庄子》“天下篇”中的抽象表达,而立足于日常生活的形象十分鲜明。例如,“八岁童孔子问答事”、“盗跖与孔子问答事”、“帽子儿与孔子问答事”三篇的故事发生的场所都在路边,不管是“八岁童孔子问答事”中首都的距离问题,还是盗跖与圣人之间的口角问题,亦或是“帽子儿与孔子问答事”中的对施行政事之人的否定,均与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这或许与当时战争多发的环境下,首都不安定,百姓被迫涌向农村的生活之苦有关。

四、结 语

《十训抄》中关于忠与孝的主张,虽有反驳孔子的倾向,但是其它部分仍然保留了原作中孔子的权威性。例如,《十训抄》六之二十九在论述廉直时,以“孔子不饮盗泉之水”为例,直接引用了《东观记》中钟离意的原话“孔子忍渴于盗泉之水”。这样一来,孔子不使用污秽东西的形象直接被运用于《十训抄》中。可见,《十训抄》中的孔子形象可以一分为二:一是作为权威者的孔子,一是作为被反驳者的孔子。而从同一篇作品中出现同一个人的不同形象,可以看出编者有将自己的主张寄托在出场人物上,从而达到说服他人的目的的倾向。

《宇治拾遗物语》中将孔子形象凡俗化,也可以说《宇治拾遗物语》自身性格有着极具庶民性的一面。同《十训抄》一样有着反驳孔子的地方,但并不像《十训抄》一样是一部富于说教性的说话集。虽然收录佛教故事,却不像《今昔物语集》般具有鲜明的佛教色彩。《宇治拾遗物语》的编撰者以收录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口传故事为目的,汇集整合了《宇治大纳言物语》所没有收录的内容,并且编写后世之事。

注释:

- ①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文学研究室《日本古典文学大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00-501 页。
- ②[日]高阳《日本中世の孔子說話: <今昔物語集>を中心に》,《知性と創造: 日中學者の思考》,日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会 2014 年版,第 54-66 页。
- ③⑤《十训抄》(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岩波书店 1999 年版,第 183、186 页。
- ④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8 页。
- ⑥(宋)朱熹《诗集传》,艺文印书馆 1974 年版,第 30 页。
- ⑦(汉)刘向撰《说苑校证》,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94 页。
- ⑧王德明主编《孔子家语注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71 页。
- ⑨[日]永积安明《十训抄》,岩波书店 1942 年版。
- ⑩胡平生《孝经译注》,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50 页。
- ⑪耿芸标校《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04-305 页。
- ⑫《宇治拾遺物語》(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岩波書店 1999 年版,第 116 页。
- ⑬金伟、吴彦译《今昔物语(一)》,万卷出版公司 2006 年版,第 402 页。
- ⑭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168 页。
- ⑮龚斌校释《世说新语校释·中》,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157 页。
- ⑯[日]小峯和明《宇治拾遺物語の表現時空》,若草書房 1999 年版,第 76 页。
- ⑰[日]长野尝一《说话文学论考》,笠间书院 1980 年版,第 244 页。
- ⑱方勇《论庄子中孔子形象的多面性与解说者的偏执》,《中国文学研究》1994 年第 2 期。
- ⑲⑳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21、494 页。